

国家、政党、社会:基于认同匮乏与公共精神短缺的价值整合

孙 杰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社会转型期,经济领域的变革推动着社会价值趋向多元,价值多元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个体价值的过度膨胀,由此而出现的价值冲突在政治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发生着消解作用,影响着政治和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均衡,在国家、政党与社会层面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认同匮乏问题。在社会生活领域,认同匮乏的具体表现就是公共精神短缺。由于公共精神短缺而导致的社会分裂会从根本上破坏国家和执政党生存、发展的土壤。执政党价值整合语境下的价值,其内在构成是以认同为核心,包括国家认同、政党认同和社会认同三重维度,分别指向共同理想、行动力量和公共精神。执政党价值整合的路径在于通过建构国家价值体系、建设良好的公民生活空间、强化公民教育来强化国家认同,通过强化意识形态认同、形象认同、情感认同和行动认同来强化政党认同,通过建构公共价值规则、协同个体价值目标、强化社区认同来强化社会认同。

关键词:认同匮乏;公共精神;价值整合;国家认同;政党认同;社会认同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6)03-0078-06

价值整合是执政党的重要职能,执政党应重视价值整合。因应社会转型期价值多元背景下认同匮乏和公共精神短缺的严峻现实,中国共产党应通过国家、政党和社会多个维度的价值整合,有效地凝聚共识和力量,不断巩固执政基础。

一、问题的提出:价值多元及其整合之道

近几年,围绕价值和价值整合展开的系列研究在学界已经成为热点。价值和价值整合成为研究热点的背后,是学者们深刻的忧患意识。如,刘景钊指出,转型时期的中国,价值观的混乱与迷失使得价值危机凸显。摆脱价值危机,走出价值困境的可行路径是进行价值整合^[1]。再如,蒋秀玲等认为,网络化时代促使社会成员反思、质疑甚至拒斥宏大的价值理念,动摇了传统社会整合的组织基础。传统社会的道德基石正在遭遇网络社会的侵蚀,传统社会的信息控制方式迅速失效,话语权的控制成为难题^[2]。

要解决这些问题,责任主体是执政党。这已是学界的共识。刘华安指出,价值是政治系统中最深

层次的要素,是社会制度设计、组织安排的决定性力量,价值整合是执政党凝聚社会的支撑力量^[3]。刘慧婷认为价值整合是执政党在其政治实践过程中广泛传播自己的社会思想和政治理念,并将其转化为治国理政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对社会的整合^[4]。这些观点都指向一个现实——价值整合是执政党的支撑力量,执政党需要通过价值整合来传播自己的理念,进而落实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巩固执政基础。

那么,执政党如何进行价值整合?学界提出了很多建议,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一是突出整合手段,认为应该加强法治,依法治理错误的价值观。陈秉公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对于违反法律的、错误的、反动的和腐朽的社会思潮,应依法进行教育引导、规劝警告,对于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应依法处理^[5]。

二是关注整合结果,认为应该强化以公平、公正为导向的价值观。如,唐莉认为,要整合价值目标,将公平放在首位;整合价值手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收稿日期:2016-04-08

作者简介:孙杰(1975—),男,湖南桃源人,博士后,从事中国政治、政党与国家治理体系研究。

经济体制;整合价值结果,协调各种利益和需求,维护社会公正^[6]。

三是侧重整合标准,认为应当建构规范的价值标准或价值观体系。如,张前指出,应形成以规范价值与德性价值为核心的都市社区价值观。规范价值强调的是社会的道德评价原则和标准以及个体对这些原则和标准的遵从。德性价值的价值定向是强调个体价值内化及品性人格性特点,使个体在没有明显外来干预的情况下控制自身行为,并按照社会价值标准自觉地行动^[7]。姚则会等认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整合应从社会价值观、道德价值观、职业价值观、成就价值观、生活价值观5个方面入手,加强教育、典型示范、舆论监督和法制建设,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价值观体系^[8]。

四是强调整合主体,认为要加强执政党在价值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任新民认为,批判性反思与整合性建构是执政党政治价值整合的关键环节,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是执政党政治价值整合的基本原则,广泛的政治动员与参与是执政党实现政治价值整合的重要途径^[9]。人们认为,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价值整合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刘丽明等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和鲜明的时代性,能够整合多种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发挥统领和聚合的作用^[10]。林春逸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主要是通过形成价值共识和完成价值整合,以增强凝聚力和创造力^[11]。黄渊基强调,价值冲突源于文化差异,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应通过文化整合、文化认同的途径推进价值整合,建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

综合上述研究情况,学界对价值整合的研究已有很多成果,但在对价值多元现状的深入解剖与应对的研究上尚有继续深入的空间。简言之,存在这些不足:很多研究侧重于对价值多元进行现象描述,在问题成因上的探讨略显不足;在问题的解决之道上,关于价值整合的手段、方法和目标,可谓众说纷纭,但其针对性、实效性和可操作性似乎仍有待提高。因此,本文的写作思路就是,在对价值多元的成因及实质进行探讨的基础上,对价值构成作深入分析解剖,从而找到执政党进行价值整合的入口和路径。

二、问题的症结:

认同匮乏与公共精神短缺呼唤价值整合

价值多元的根源在于经济领域的变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从单一公有制结构向以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转型,原来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构建的单一、封闭的社会结构日益松散,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迅速分化出多个新阶层,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结构和思想文化观念也出现了深刻变化。各种思想观念相互激荡,“从社会思潮的内容来看,新时期中国社会思潮呈现出多样的形态。如后现代主义思潮、后殖民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新保守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市场社会主义思潮、西方女权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第三条道路’思潮、大众文化思潮、民间信仰思潮等相互激荡。”^[13]

肇始于经济领域的变革,推动着转型期社会价值走上了裂变和多元化进程,“在现代化进程中,不仅会产生个人的个性化和独立性,而且会产生一个三重的个性化进程,即脱离了传统的统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由此带来的社会安全和联系的丧失;传统价值、标准和信仰模式的弱化和组合的新形式。现代化导致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日益彼此分离地发展,同时也产生了个性化的因素。”^[14]价值多元固然可呈现不同的社会视角,代表更多的自主、自由增量,但每个类型的社会都需要一种有效的、普遍适用的价值规范,以达成社会心理均衡和结构稳定。“因为民主政治依赖自愿的妥协和深入,它要求公民至少最低限度地认同公共生活和某种集体利益的观念。”^[15]不同价值观与执政党主流价值、社会公共价值之间的契合度与偏离度,应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会造成社会失序。“一个社会,当它不仅旨在推进它的成员的利益,而且也有效地受着一种公共的正义观调节时,它就是一个良序的社会。”^[16]

但价值多元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个体价值的过度膨胀,日渐出现信念缺失、道德缺位和个人至上等价值冲突现象,在政治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发生着消解作用,影响着政治和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均衡。在政治领域,社会阶层意识日益独立,执政党在计划经济时代确立的主流价值体系受到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相对淡化,执政党的思想基础、社会基础受到削弱。由于执政党主流价值体系是包括国家认同、政党认同、社会认同在内的高度共容结构——执政党通过国家认同来广泛凝聚各个阶级和阶层,通过政党认同来强化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通过社会认同来增进政党向心力和凝聚力——所以不仅与个体价值和执政党主流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相关联的政党认同降低,成为价值多元结构下的突出政治现象,而且在相当一部分人群中,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也越来越淡薄,甚至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区,认同

程度也是非常低的。简而言之,就是价值多元引致价值冲突,进而出现国家—政党—社会三位一体的认同匮乏。

认同匮乏不仅影响政治稳定,更为严重的是还影响着社会生活。在社会生活领域,个体价值和公共价值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社会认同匮乏最为鲜明,集中表现为公共精神短缺。例如:高空抛物、行车抛物、闯红灯、乱丢垃圾、乱刻画、乱张贴、乱搭建、宠物扰邻、随意插队等问题成为“中国式”老大难问题;有的人对主动参与社会建设、社会服务没有多少热情,更关注自身的生活状态和私人利益,片面和过度地强调自己的主张和权益,个体意识过度膨胀,缺乏自觉维护公共利益的意识,出现了民主意识增强而法制意识削弱、私权意识彰显而公权意识淡薄、表达个人主张的愿望强烈而听取他人意见的意识缺乏等情况——比较常见的场景就是,召开矛盾协调会、决策听证会,只要自己讲,不愿听甚至不给别人机会讲,少数人不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大多数人的正当权益之上,等等;在一些社区,有的人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参与度明显不足,对社区存在着严重的疏离感,社区意识比较淡漠,对社区责任缺少认知,不太关心邻里和社区事务,很多社区居委直选、人大换届选举选民自主登记率小于上门登记率。

公共精神短缺的内在逻辑在于:社会转型未必会带动社会成员的转型,一方面由于自由与法律、民主与法治、权利与义务等方面辩证关系的公民教育未能及时跟进,另一方面部分群众在脱离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元制社会管理模式、进入公共生活领域之后,未能及时适应社会转型期新的社会形势,成长为在政治素质、民主素质、法律素质、道德素质等方面都合格的公民——具有公共精神和认同意识的公民,这是个体自身素质与社会发展外部环境的分裂。这种自身处于分裂状态的个体之间也是不相容的,如果不加以整合,那么势必会发展为整个社会体系的分裂。社会是国家和政党建立的基础,由于公共精神短缺而导致的社会分裂会从根本上破坏国家和执政党生存、发展的土壤。

三、以认同为核心:价值构成的多重维度

认同匮乏与公共精神的短缺已将价值整合提上重要日程,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价值整合。政党作为“冲突的力量和整合的工具”^[17],价值整合是其重要职能,包括对社会成员理念、情感、信仰等内在思维过程和体验过程的介入、培育、塑造和引导。执政党要找准价值整合的路径,前提是对价值构成的

准确把握。执政党价值整合语境下的价值,应当以认同为核心,包括国家认同、政党认同和社会认同三重维度。

价值的第一个维度是公民对所属国家的共同情感,即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是公民对国家的忠诚和归属感,是社会凝聚力的最高表现形式,是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伯特兰·罗素对此有详细的描述,“古代所有大国,除了埃及以外,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而遭受不稳定之苦。当没有什么比马儿跑得更快的时候,中央政府很难有力地控制边远地区的属官或者地方总督……亚历山大、阿提拉和成吉思汗都曾拥有庞大的帝国,但是当他们去世的时候,帝国也就分崩离析了,在这些帝国里,统一完全取决于一位伟大征服者的威望。这些形形色色的帝国不存在心理上的统一,而只是武力的统一……在现代技术发明以前,要把一个大帝国团结在一起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帝国全境的社会上层都有了他们由以团结在一起的共同情感。”^[18]执政党对国家的管理和对社会的凝聚,要依靠催生、培育和强化公民对于国家的共同情感,不断夯实国家认同的心理基础。

价值的第二个维度是组织内外成员对特定政党组织的忠诚或信任,即政党认同。政党认同由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坎贝尔在1957年的《选民决定》和1960年的《美国选民》两本著作中提出,认为政党认同是个人在心理层面上对政党的忠诚感。忠诚、信仰等政治概念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意识形态关系到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一个政党整合功能危机的起点是意识形态对党员和普通民众影响力的下降。党员对本党的纲领和章程所确立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动摇、转移,是对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提出的最严重的挑战。”^[19]可以说,政党的价值观是政党政治生命的根基。戴维·E.阿普特认为,“在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系统内,政党显然不仅限于充当传输私人需求给公共决策制定者的消极角色。他们也并非接收不同的诉求、信念和观点的汇集设备。恰恰相反,一个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的政党扮演着积极的创业者的角色,致力于形成新观念,为那些观念建立一个交流网络,在将公众与领袖相连的过程中创造、动员和行使权力。”^[20]政党不仅仅是个体意见、诉求的代表者,而应是个体价值观的主动整合者和社会价值的创造者、维护者,在价值整合中实现社会动员。

价值的第三个维度是社会成员对于社会的认同、接受和融入,即社会认同。“民主政治不是单单建立在个人的权利或私人利益上面的。这仅仅是盾

牌的一面。民主政治同样也建立在个人作为社会一员的职责上。它把共同利益建立在共同意志上,同时嘱咐每一个聪明的成年人扮演一个角色。”^[21]个体是社会的人,无数个个体组成社会,将无数个个体凝聚在一起才成为社会,而将无数个个体凝聚在一起的方法、手段就是找到他们共通的要素,如共同利益、共同意志、共同价值,等等。“整合问题涉及保证适当的情感依附的需要,这种依附导致团结与合作愿望的发展和持续。这类情感联系不必取决于所获得的利益,或取决于对个人或集体的目标达到所做的贡献。”^[22] 社会团结其实就是一种情感联系,这种情感联系是社会成员的共同情感,不必然受利益影响。社会成员团结、凝聚并发生情感联系的社会单元是社区,社会成员对社会的认同往往首先体现为社区认同。

认同本来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意指人们认同自己所属的群体,认为自己是其中一员,并与群体其他成员产生情感联系。在国家和社会生活层面,认同体现为一种集体观念,社会成员具有共同的理想、信仰和价值观。在政治领域,认同是指人们对政治组织和政治生态的认可、接受和支持。国家认同、政党认同和社会认同构成了价值的主体内容,分别指向共同理想、行动力量和公共精神。国家认同决定了同一国籍的公民,以地理范畴内的国土为共同家园,以共同家园的安全和利益为奋斗理想。政党认同保证了政党组织在人群中的凝聚力、号召力,使政党能够综合和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转化为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并促进实施。社会认同决定了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人们遵守公共生活规则,共同维护社会的有序运行。

四、执政党价值整合的路径

基于价值构成的分析,执政党应当依循国家认同、政党认同和社会认同3个路径进行价值整合,从而构建起涵盖国家、政党、社会三位一体的新的主流价值体系。

1. 强化基于共同理想的国家认同

不断强化国家认同是执政党进行价值整合的根本战略任务。国家认同是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指标,执政党必须担负起强化国家认同的政治责任,有效地提升国家形象,凝聚公民。

建构国家价值体系。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这也是一个国家区别于另一个国家的根本特征,国家也因此由地域概念上升为政治概念。国家价值体系是公民普遍接受的国家理念,是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综合作用的产

物,它作为强大的集体意识,渗透和控制着公民的个体意识,强化公民对现行国家秩序、文化传统的认可和遵守。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国家公民价值理念的共同基因,执政党的价值整合使命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先进政党文化的基础上,因应不断变化的国家发展要求和社会形势,建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体的新型国家价值体系,不断提升国家软实力。

建设良好的公民生活空间。公民对国家的忠诚是一种强大的国家认同。公民对自己所属国家的忠诚来自于国家提供给他们底护以及公民由此而体验到的满足。公民生活于一个国家之内的满足,可以用安全感、幸福感这两个指标来衡量。公民的安全感来自于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和个人权利的安全保障。执政党应加强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发展国家的硬实力,为公民提供强大的安全保护,提升公民自信。同时,还要加强国家法治建设,完善国家法律制度体系,维护公平正义和秩序,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公民的幸福感来自于生活质量,执政党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能有效地解决环境恶化、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等突出问题,增加公民的家庭财产收入,有利于提高公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强化公民教育。公民教育主要包括3个层面:一是义务观教育;二是道德教育;三是理想教育。执政党应大力倡导共同善的公民生活,在保障公民权利的同时加强公民的义务观教育。强化公民的道德教育,提高公民的整体道德水准和文明素质,进而提升国家形象。推进公民的理想教育,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来凝聚社会共识,引导公民树立国家共同理想,乐于服从国家需要,积极参与共同家园建设。

2. 强化基于力量凝聚的政党认同

不断强化政党认同是执政党进行价值整合的核心目标和关键任务。政党认同实际上是组织内外成员对执政党的信任或追随,包括政党意识形态、政党形象、政党运行透明度、政党成员参与程度、政党开放性、政党组织成员与组织外支持者关系等一系列变量,这些变量都会影响到社会成员对执政党的信任程度,并最终影响到执政党号召追随者、凝聚各阶层力量的能力。

强化政党意识形态认同。政党认同的第一个层面是意识形态认同。意识形态就是执政党的宗旨、方针、政策以及奋斗目标,必须具有逻辑上的科学性和实践上的说服力,为执政党及其支持者所信服,并为执政党的奋斗目标、发展前景所激励,愿意团结在执政党周围一起奋斗。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认同体现

为执政党的价值理念渗透过程,也就是执政权威扩张和强化的过程。政党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来自对社会价值的有效反映和集中,不断促进社会共识的形成并将有益的社会价值吸收到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中,不断因应社会现实开展执政党意识形态的传播,不断促进政党的意识形态被社会大众广泛接受因而社会化,使之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集体行动指南。“凡是在统治权力树立起权威的地方,它的首要职能就是为信仰、传统和集体行为赢得尊重,换句话说,就是为了保护共同意识去防范任何内部的或外来的敌人。因此,它成了集体意识的象征……集体把权威施加在了每个人的意识里,并从中获得了力量。”^[23]执政党必须着力于构建和发展有利于强化政党认同的意识形态并使之成为集体意识的象征。

强化政党形象认同。政党形象可细分为若干个子变量:能力、效率、责任、廉洁、公平正义,等等。政党形象体现为执政党及其政府决策前听取和尊重民众意见的程度、决策中对社会各方面利益的取舍标准以及民众参与决策的程度、政策实施的社会效果、官员的履职情况以及奖惩措施,还包括公众与执政党及其政府沟通的渠道、公众意见对执政党及政府的影响力。廉洁不仅是执政党及政府的基本行为准则,更是公众的一种较高层次的价值认同,公众对执政党及政府廉洁与否的判断,更多地来自于外在观察和心理感受。因此,必须努力改进执政党及政府的工作作风,严格执行财经纪律,推进廉政法规建设,加强对执政党权力运行的自约束和自监管,树立执政党的廉洁形象。政党运行的透明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基于制度设计的透明度对于凝聚民心、提高认同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必须用党务公开、政务公开等制度来保障执政过程的透明度,努力提高执政党及政府公共决策、处理公共事务的透明度,不断提高政策制定的公开化程度以及公众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了解程度。

强化政党情感认同。政党认同还取决于执政党组织成员与组织外支持者的互信关系。努力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构建互相信任的党群、干群关系,不仅有利于提高政党认同,而且有利于提高社会凝聚程度。“政党运用各种机制来将它们自身和潜在成员团结在一起。”^[24]任何一个政党都要尽可能地向社会生活空间拓展活动边界,打破封闭半封闭的内循环惯性,不断提高组织的开放度与亲和力。执政党在制度设计上要充分考虑到便于群众的参与和监督,强化公众监督有利于使群众与执政党之间的权力授受关系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从而切实打破公

众的不信任感和疏离状态,增进公众对政党的情感认同。

强化政党行动认同。执政党应当最大限度地把普通党员调动起来参与组织各项行动,党员对组织的认同在于其认同和积极参与组织行动的程度。为此,执政党必须为党内的追随者搭建便于参与的开放性平台,这一平台其实就是一种民主机制。党内民主建设进程决定了党员对执政党的行动认同和追随。俞可平认为,“决定党内民主的主要变量有:党内选举、决策和监督法规,各级党委领导人的产生方式,党委推荐和任用干部的民主程度,党代会的作用,党委的决策和议事程序,党内的权力监督,党务公开的程度,党代表的直接选举,以及执政党与其他民主党派的协商情况。”^[25]党员在党内组织生活中的参与程度取决于组织授权,即政党在多大程度上把各项权力分解授予不同层级党员。执政党党员参与执政党权力运行和党的行动,一是要有一套比较完善的机制加以规范和保障;二是要有一系列载体、平台以提供有利于党员作用发挥的空间;三是要正确运用激励手段,建立公平公正的精英录用制度。

3. 强化基于公共精神的社会认同

不断强化社会认同是执政党进行价值整合的基础工程。在利益观、价值观日益多元的社会形势下,执政党应注重抓好社会公共生活空间的价值规范和价值引领,强化以公共精神为价值内核的社会认同,促进社会凝聚。

建构公共价值规则。公共价值规则体现和反映了社会人群所普遍认同和接受的价值观念,是一种对社会人群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公共价值规则发生作用的内在机制,一是社会压力,二是法治约束。社会压力机制即违反规则者因为需要承受个人形象和社会地位受到影响的压力,因而不得不遵守社会共同价值规范,修正不符合社会主导价值的行为,以更好地融入社会。法治约束机制即通过严格实施法治,使得违反规则者所最终付出的代价大于实际收益,从而有效强化社会人群的规则意识。因此,执政党一方面应组织公众共同构建社会生活公共规则、大力弘扬公序良俗,另一方面应发动公众通过社会自治等形式和载体加强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有效规范社会成员的价值和行为,强化社会成员的公共精神,构建良序社会。

协同个体价值目标。协同社会成员价值目标的关键在于扩大社会参与,在社会参与中促进不同的价值目标趋向整合。社会参与体现了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以及对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认同和融入,有利于保持社会活力。一个符合现实逻辑的推论是:在

一个共同体中,每一名个体的理性诉求是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但只要组织者在集体行动中协调兼顾到个人的合理需求,注重培养集体归属感和认同感,个体就会在情感和价值层面上趋同于集体行动。因此,执政党在推进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要为不同层次、不同利益、不同动机的人群找到价值目标上的交叉点,通过确立一种有利于强化集体激励和身份认同的共同价值目标,促进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使社会不同个体的价值融于公共价值,令不同个体价值之间和谐相融、互为依存。

强化社区认同。鉴于在社会转型期,社区已经成为社会建设的主场域,成为公共生活的主要场域,执政党应当立足于社区这一市民生活空间来强化社会认同,使社区从地域共同体升华为精神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社区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集团,以社区为原点塑造健康和谐的社会人际关系,是价值整合的最佳路径选择。在社区这样的社会生活空间中,比较适宜培养成员的忠诚感,这种忠诚感得益于人群之间社会距离的接近。社区认同有两个基础变量:一是睦邻关系,二是利益关联。密切社区睦邻关系的着眼点在于:通过大力提倡和组织志愿服务活动,加强群众自助互助和自我教育体验,形成互惠型的人际关系;完善社区公约、楼组公约,开展社区公德、家庭美德教育,努力解决社区存在的违章搭建、乱扔垃圾、宠物扰邻等突出问题,提高社区和谐度;促进社区人群的交流、交融,从而形成熟人社区。加强社区人群的利益关联,执政党及政府需改变包办一切的做法,将社会公共生活空间及社会自治权能还给市民,将涉及社区公共利益的事项交由社区市民民主协商,发动社区市民自行确定公共项目,协调公共利益,提高社区市民之间的利益关联度。根据不同社区的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社区公共服务,扶持社会组织兴办社区公益事业,参与社会治理,提高市民与社区的生活关联度。

参考文献:

- [1] 刘景钊.转型期如何摆脱价值危机:兼论价值整合与价值共同体的建构[J].探索与争鸣,2013(1):51-56.
- [2] 蒋秀玲,李棉管.网络化时代的社会整合议题[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3(3):61-65.
- [3] 刘华安.民间组织的崛起与执政党的政治整合[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2):14-17.

- [4] 刘慧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执政党社会价值整合的思想基础[J].学习与探索,2009(6):86-87.
- [5] 陈秉公.论国家意识形态“高势位”建设与实现“引领”功能的基本方式[J].思想政治教育,2009(5):7-11.
- [6] 唐莉.价值整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路[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3):82-84.
- [7] 张前.都市社区价值观载体建设与价值观的形成[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55-58.
- [8] 姚则会,杜金亮.经济转型期价值取向的冲突与整合[J].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6):104-106.
- [9] 任新民.政治价值整合: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课题[J].社会主义研究,2006(1):52-54.
- [10] 刘丽明,李泽华.浅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整合功能[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4):252-253.
- [11] 林春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目标探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5):15-17.
- [12] 黄渊基.文化差异与价值整合:多元文化冲突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J].湖南社会科学,2014(4):7-9.
- [13] 朱汉国.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51.
- [14] 托马斯·海贝勒,君特·舒耕德.从群众到公民:中国的政治参与[M].张文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189.
- [15] 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蒂斯.民主与资本主义[M].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82.
- [16]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5.
- [17]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M].张华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36.
- [18] 伯特兰·罗素.权威与个人[M].储智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7.
- [19] 王邦佐.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66-267.
- [20] 戴维·E.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M].陈尧,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237.
- [21] 霍布豪斯.自由主义[M].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16.
- [22] 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M].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531.
- [23]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47.
- [24] B.盖伊·彼得斯.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M].向民,段红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23-124.
- [25] 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232.